

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研究與訓詁學

董志翹

近二十年來，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主要原因是隨着佛教史、文學史、漢語史、文化史、中外交通史等的研究的需要，人們首先需要讀懂、理解漢文佛教文獻，利用漢文佛教文獻，所以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到這些文獻的語言。

首先是漢語史的研究，由於種種原因，以往呈現出“重兩頭、輕中間”的傾向，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呂叔湘、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等衆多學者的提倡、引導下，中古漢語、近代漢語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一大批中青年學者投身其間。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研究的語料問題，特別是拿中古漢語研究來說吧，由於當時社會動蕩、戰亂頻仍，文獻典籍損毀散失嚴重，中土文獻傳世不多，加上歷來有文化的人一般重“文”輕“俗”，因而其中能較好反映當時口語特點的中土文獻更是鳳毛麟角。具有一定篇幅和語料價值的中古中土文獻：文學類有《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等。中古時期小說、雜記見於著錄的不下三四十種^①，但大多原本早已散佚，經後人輯綴而成，其間訛誤改竄甚多，作為語料不甚可靠。漢魏六朝詩歌約有八千多首，其中的樂府民歌較有語料價值，但所佔比例較小。史學類有《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後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等，其中收錄的當朝人詔令、奏疏、信札及民間謠諺均值得重視；政治哲學類有《論衡》、《顏氏家訓》；地理類有《水經注》；科技類如醫

書《肘後備急方》、《諸病源候論》及農書《齊民要術》等。晉人雜帖口語程度很高，但數量更少，且大多寥寥數語，不成篇章^②。除此以外，中古時期的文獻幾乎都用極少反映當時實際口語的文言文寫成。要扭轉這一局面，必須尋找較為集中的能較好反映中古實際語言的文獻語料。經過研究者的努力，終於開掘出了中古語言的富礦——佛教文獻語言。從東漢至宋，漢文佛典總數達 2148 部，8736 卷。中古時期的漢文佛典約 960 部，2990 卷，2400 萬字。與這一時期的中土口語性文獻相比，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③。

雖然從三四十年代就有學者對漢譯佛典的語言有過研究，但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夠（更多用於音韻學研究，作為梵漢、藏漢對音資料）。直到編纂《漢語大詞典》，例證中仍較少採用這類材料。

同時，傳統的訓詁學又要從經學附庸的地位解放出來，正如郭在貽先生所說：“我國傳統的訓詁學其主要目的是為經學服務的，因此它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儒家經典，它所解釋和考辨的主要是先秦兩漢的古字古詞。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先秦兩漢的古字古詞便是訓詁學的唯一研究對象。訓詁學作為一種古代文獻語言學，它應該而且必須衝破為經學服務的樊籬，去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開闢新的研究領域。這個新領域，主要指的是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因為漢魏六朝以後的文言詞語，基本上是承襲了先秦兩漢的書面語詞，沒有多少新的發展變化，而漢魏六朝以後的方俗語詞，則出現了許多新情況，而又為傳統訓詁學所不措意的。今天我們研究訓詁學，必須對方俗語詞的研究予以充分的重視。”^④於是，人們開始注意漢魏以降方俗語詞的訓詁研究，而佛教文獻正是漢魏以降方俗語詞的淵藪。

漢語史研究、新訓詁學兩股潮流合而為一，遂興起了漢文佛教文獻語言訓詁的高潮。

從訓詁學角度研究漢文佛教文獻語言概況

一、佛教文獻詞語的考釋

(一) 在中古、近代漢語詞語訓釋過程中，以漢譯佛典用例作佐證，當以蔣禮鴻先生為先導。他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乃開風氣之作。在訓釋敦煌變文中大量“字面生澀而義晦，字面普通而義別”的詞語時，他常常以《增一阿含經》《妙法蓮華經》《賢愚經》《雜寶藏經》《雜譬喻經》《百喻經》等漢譯佛典以及《涅槃經義記》《高僧傳》《續高僧傳》《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法苑珠林》和禪宗語錄等中土佛教文獻詞語作為旁證或源頭。在蔣先生的啓發下，江藍生的《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利用了《百喻經》《六度集經》《生經》等佛教經典 14 部、蔡鏡浩《魏晉南北朝語詞例釋》引 23 種漢譯佛典，王雲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語詞例釋》更是廣泛利用漢譯佛典及中土佛教文獻，引用數量達 138 部。董志翹、蔡鏡浩《中古虛詞語法例釋》等也多有援引。

(二) 專門考釋漢譯佛典詞語的，出現了大批論文。如：梁曉虹《佛經詞語札記》（《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 2）《〈六度集經〉詞語札記》（《古漢語研究》1990. 3）張錫德《〈百喻經〉詞語札記》（《語文園地》1985. 9）吳金華《佛經譯文中的漢魏六朝詞語零拾》（《語言研究集刊》1988 第 2 輯）張聯榮《漢魏六朝佛經釋詞》（《北京大學學報》1988. 5）太田辰夫、江藍生《〈生經·舅甥經〉詞語札記》（《語言研究》1989. 1）朱慶之《“將無”考》（《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影響”今義來源》（《文史知識》1992. 4）方一新《漢魏六朝翻譯佛經釋詞》（《語言研究》1992. 2）《〈興起行經〉語詞札記》（《福州師大學報》2000. 1）《東漢六朝佛經詞語札

記》(《語言研究》2000. 2) 馬由《〈長阿含經〉釋詞》(《古漢語研究》1992. 4) 胡湘榮、肖小敏《佛經詞語選釋》(《古漢語研究》1992. 4) 顏洽茂《六朝佛經口語詞例釋》(《語言論叢》1994)《魏晉南北朝佛經詞釋》(《杭州大學學報》1996. 1) 李緒洙《漢語佛教詞語淺析》(《山東大學學報》1995. 3) 汪維輝《先唐佛經詞語札記六則》(《中國語文》1997. 2) 何亞南《漢譯經與後漢詞語例釋》(《古漢語研究》1998. 1)《釋“嵐”》(《中國語文》1999. 4)《漢譯佛經與傳統文獻詞語通釋二則》(《古漢語研究》2000. 4) 楊黛《佛經詞語隨札》(《古漢語研究》1998. 2) 陳秀蘭《也考“嵐風”》(《中國語文》1999. 4) 陳文傑《早期佛典詞語雜俎》(《宗教學研究》1999. 2)《〈賢愚經〉詞語考》(《欽州師專學報》2000. 1)《〈生經〉詞語考釋四則》(《語言研究》2002. 2) 錢群英《魏晉南北朝佛經詞語考釋》(《浙江大學學報》1999. 6)《佛教戒律文獻釋詞》(《語言研究》2004. 2) 等等。

(三) 對中土僧俗所撰的佛教文獻語詞的考釋, 有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 2) 胡竹安、張錫德《〈法顯傳〉詞語札記》(《語文研究》1986. 4) 袁賓《〈五燈會元〉詞語釋義》(《中國語文》1986. 4)《〈五燈會元〉詞語續釋》(《語言研究》1987. 2)《〈五燈會元〉口語詞探義》(《天津師大學報》1987. 5) 董志翹《〈五燈會元〉語詞考釋》(《中國語文》1990. 1)《〈宋高僧傳〉語詞札記》(日本白帝社《中國語研究》第35號, 1993)《〈高僧傳〉詞語通釋》(一)(《漢語史研究集刊》1999. 2)《〈高僧傳〉詞語通釋》(二)(《漢語史研究集刊》2000. 3) 呂幼夫《〈祖堂集〉詞語選釋》(《遼寧大學學報》1992. 2) 周志鋒《〈法苑珠林〉詞語選釋》(《寧波師院學報》1994. 4) 葉紀勇、董西國《〈高僧傳〉詞語札記》(《臺州師專學報》1999. 4) 王小莘《〈高僧傳〉語彙研究》(《語言學論叢》

1999 第 22 輯) 張文德《〈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拾遺》(《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0. 1) 方一新《南朝人撰三種觀世音應驗記詞義瑣記六則》(《中國語文》2001. 2) 朱慶之《王梵志詩“脆風壞”考》(《中國語文》2001. 6) 化振紅《〈洛陽伽藍記〉札記三則》(《中國語文》2003. 2)。據不完全的統計, 自 1980 年至今, 此類論文有 380 篇左右。

另外, 在不少漢語史研究論著, 如朱慶之的《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顏洽茂的《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梁曉虹的《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4)、王紹峰的《初唐佛典詞彙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等以及近年來不少研究佛典語言的博、碩士學位論文中, 均有佛典詞語考釋的章節或內容。而且在研究中, 也越來越重視漢譯佛典語言與中土文獻語言的比較, 如胡敕瑞的《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巴蜀書社 2002)、陳秀蘭的《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比較研究》(韓國新星出版社 2004) 等。

對於漢譯佛典詞語集中進行考釋的專著, 臺灣學者曲守約先生曾於 1972 年出版了《中古辭語考釋續編》一書, 該書對自東漢以迄唐初佛典中的 660 多個詞語進行了考釋, 根據曲先生的說法, 乃“全係取自大藏經所行用之辭語, 而加以匯集、排比、研釋, 以求得每辭語之明恰完全解釋; 並盡可能將其初始起源, 當時流況, 以及後來之演變影響, 試為掘出。”^⑥而大陸上, 當數李維琦先生的專著《佛經釋詞》(岳麓書社 1993)、《佛經續釋詞》(岳麓書社 1999) 為集大成者, 兩書分別從東漢至隋的 56 部佛經中選釋了 360 多個詞語, 作者運用了現代化的研究手段, 佔有豐富的材料, 挖掘出大量新詞新義, 並堅持古今貫通, 多角度佐證, 糾正了一些成說, 頗具創新意義。兩書分別出版於 1993、1999 年, 近五年來, 李先生在廣泛聽取意見, 反復打磨, 不斷

增刪的基礎上，於 2004 年出版了新著《佛經詞語匯釋》，凡釋詞 325 個。此書不是前兩書的簡單合併，正如作者在該書後記中所云：它“刪去了一些我後來發現是別人已經說過而我又沒有什麼補充的條目，增加了若干新詞目，對於我見到了的人家的批評，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大致都有一個交代。”^⑥因此是一個後出轉精的本子。

二、佛經音義著作的研究和利用

古書注釋中有一類著作，它包括辨音與釋義兩部分，習慣上稱為“音義”，傳統訓詁學的音義著作有徐廣的《史記音義》，徐邈的《毛詩音義》以及現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陸德明《經典釋文》等。

自佛教傳入我國之後，翻譯佛教經典的工作盛行。譯經文字、漢梵夾雜，讀起來很困難。一些佛教徒採用了音義方式來注佛典。他們不僅注漢語的詞，也注域外譯語的詞^⑦。

在漢魏以來俗語詞研究中，以往可以直接利用的故訓材料並不太多，一是因為歷來俗語不登大雅之堂，歷代以經學為正統的文人很少為俗語詞作訓釋；二是有許多俗語詞當時活躍在人們的口頭，當時人理解上沒有太大的難度，所以也不必作注釋。像服虔的《通俗文》之類，實為罕見。不過，有關俗語詞的訓釋材料也並非完全沒有，比較集中的材料就是佛典的音義，如唐釋玄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慧苑的《華嚴經音義》、遼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等。

佛經音義著作在訓詁學上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過去由於研究不夠，尚未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有時甚至產生誤解，這在一些著名專家身上也難幸免。比如著名佛教史專家湯用彤先生在論及《大正藏》第 56 卷日本僧人中算的《妙法蓮華經釋文》時云：

中算的《法華經釋文》，採錄中國古書甚多，但是未經調查研究，我們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新材料。自然，要知道一書是否有用，必須用它。而要用它的時候，對於像中算這樣的書，應當查覈其中的材料，這樣纔可以發現問題，知道相關的情況。

現在姑且抄中算《釋文》下列一條爲例，以見此書中所包含的問題。

“政使上之盛反。《札記》云，～者正也。清徹云，令也。或本作正。鄭玄云，正者政也，定也。聖德太子云，～～猶假令也。又蓋也。今案所出未詳。”

此條在《方便品》開頭的地方。我們取窺基《法花音訓》（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檢查一下，並沒有“政”或“政使”字樣，並且，我們查了一下《法華經》的原文（《藏要本》卷一，頁九、二面二行），文曰：

“正使滿十方”

可見中算所用的經文“正”字實際是寫的一個別字——“政”。而且窺基的經，本來就是“正”字。“正”字較常見，所以窺基無此條。“政”字經中少見，所以中算書中有這個“難字”。而且據中算所引清徹（《宋高僧傳·明律篇》卷十六中有傳。但未說到他有《法華經》的著作）云“令也”是解釋“使”字，並云“或本作正”，可見中算也知道此字有兩個寫法。照這樣說來，中算此書，不但現在印本已知有錯字，而且就是他引的書，甚至《法華經》本文也有別字。聖德太子是日本推進佛教最有力的人。他在公元607年曾遣小妹妹使隋，他著有《法華經疏》。其“政使”爲“假令”，爲“蓋”，實不可解。所以，我們認爲此書是可能供給我們一些資料，但必須注意其錯誤^⑧。

翹按：“政使”（字或作“正使”），作爲同義並列複音連詞，

用在複句的前一句，表示讓步，下句表示結果或推論，相當於“即使”、“縱使”的用法，漢譯佛典中多見。如：

阿難，政使是三千大千世界滿其中火，菩薩便當入過其中，求聞是法受持諷誦。（西晉竺法護譯《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12—30c）

又問：“如來何不往舍衛王舍城及餘國結安居，而來此國耶？”答曰：“若置舍衛王舍城，政使往到鬱單越或忉利天，魔王亦當來蔽，不可得隱避。”（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毗婆沙》24—706c）

正使千乘車聲，不如雷聲。（西晉帛法祖譯《佛般泥洹經》，1—168b）

正使汝以革繩重係，群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終不能舍如是語、如是見、如是慢。（後秦佛陀耶舍共竺法念譯《佛說長阿含經》，1—68 c）

魏晉以降中土文獻中亦比比皆是。如：

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三國志·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

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晉書·佛圖澄傳》）

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文獻通考·卷十四，徵榷考一》）

“正”作表讓步連詞，漢代已見。《漢書·王莽傳》：“嚴尤奏言：‘人犯法，不從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顏師古注：‘假令有惡心，亦當且尉安。’劉淇《助詞辨略》云：‘假令猶縱使也。正得爲即，故亦得爲縱。今云即使如何，是縱令如何也。’因‘使’亦有‘縱使’義，故‘政使（正使）’爲同義複詞，此乃魏晉後始見。而中算（約生於十世紀初）的《法華經釋文》是目前見到最早準確解釋‘政使（正使）’一詞的訓詁資料，

可見音義類著作的訓詁學價值。

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導乎先路，前後引用《玄應音義》《慧琳音義》達 64 次之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佛經音義材料逐漸受到訓詁學界的重視，如王雲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詞語例釋》收釋漢魏兩晉南北朝隋詞語 500 餘條，引用《慧琳音義》55 次，《玄應音義》8 次。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等都大量借鑒、利用了佛典《音義》的訓釋成果^⑨。而僅研究《慧琳一切經音義》一書者，就出版了兩部著作。一為徐時儀的《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一為姚永銘的《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姚著還專列“訓詁篇”，就“《慧琳音義》與漢語外來詞研究”、“《慧琳音義》與俗語詞研究”、“《慧琳音義》與語源學研究”、“《慧琳音義》與古籍的解讀”、“《慧琳音義》與語詞文化內涵的研究”諸方面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漢大學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先生主編，由眾多專家學者經歷 18 年的辛勞編撰而成的《故訓匯纂》的出版（商務印書館 2003 年），如果說其價值遠遠超過《經籍纂詁》的話，那麼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該書將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之訓詁材料悉數收錄在內，為訓詁學、漢語詞彙史、語法史的研究及詞典編纂提供了極大方便。

三、佛教文獻的整理（校勘、標點、今注、今譯）

目前國際流行的《大正藏》就是於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至昭和九年（1934）以《高麗藏》為底本，參以他本編成的。全書一百冊，包括經文 85 冊、《昭和法寶總目錄》3 冊和圖像 12 冊。該藏的前 55 冊略相當於我國歷代藏經的內容，收錄佛教經

籍 2276 部 9041 卷 (約 7000 萬字), 第 56 冊至 84 冊為日本佛教著述, 85 冊的“古逸部”和“疑似部”收錄了近代以來, 主要是敦煌發現的一些佛教典籍 (很有價值), 全藏經過校勘、斷句、編制目錄人名經名索引, 極便使用。但在使用過程中, 人們也不斷發現, 該書仍存在着不少校勘、斷句方面的錯誤。

1982 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把重編《中華大藏經》列入古籍整理規劃重點項目, 預定 20 年完成, 分正、續兩編。正編以稀世珍本《趙城金藏》為底本編輯影印, 收錄歷代藏經中以千字文編次的部分, 總計約 2000 種 10000 餘卷。續編收錄歷代藏經中無千字文編次的部分, 約 2200 餘種 13000 餘卷, 正續兩編總數可達 4200 餘種 23000 餘卷。該書收錄完整、版本考究、校勘精到 (選用國內現存八種最有價值的藏經版本參校)。應是迄今大藏經最佳整理本, 本人在使用中已覺受惠無窮。

與此同時, 近年來, 不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些漢文佛教文獻的單行校點、今注、今譯本, 這很有利於佛教文獻的普及和利用。不過這些本子質量良莠不齊, 有些本子商業化的氣息濃重, 詞語訓詁上存在的問題觸處可見, 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商榷文章。僅本人近年來就撰寫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商榷》(一)(二)(三)(日本《俗語言研究》3、4、5 號, 1996~1998)《〈高僧傳〉標點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1. 1)《〈高僧傳〉標點商榷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 1)《〈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點學誤》(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 5)《〈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點學誤》(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 2)《漢譯佛典的今注今譯與中古漢語詞語研究——以〈賢愚經〉〈雜寶藏經〉譯注本為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1)《〈宋高僧傳〉標點獻疑》(日本《花園大學研究紀要》1993 年 25 號)《評〈行歷抄校注〉》(《學術集林》總第 13 卷, 1998) 等一系列文章。

四、佛教文獻語言詞典的編纂

以往的佛教詞典所釋大多為佛教專門詞語，而對於佛典中的普通語詞收釋很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學者編製了不少漢譯佛教文獻的詞語索引，比如花園大學、京都禪文化研究所編製了不少禪宗語錄詞語索引，廣島大學就編製了《高僧傳》詞語索引，奈良女子大學的松尾良樹先生編製了大量漢譯佛典詞語索引，這些都為編寫佛教文獻語言詞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近年來，日本辛島靜志先後出版的《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等佛經專篇詞典，均收錄佛教詞語、音譯詞和古白話口語詞數千條，這些詞無論從立目、分義項、釋義，還是書證時代上，往往可補《漢語大詞典》之不足。而每詞下附有梵本、異譯佛經中現對應的詞語，是佛經語言詞典的典範性作品。

總之，近二十年來，從訓詁角度研究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的成果是豐碩的，非常令人鼓舞。本人在這裏限於篇幅和學識，難免掛一漏萬。

從訓詁學角度研究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的幾點思考

一、目前從訓詁的角度考釋佛教文獻詞語的方法，大多採用排比歸納的方法，而排比用例，在有了電子佛教文獻語料庫及相應檢索系統的今天，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即使是對一些詞的使用頻率統計，也不再是難事。所以我們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對用例的分析上，放在詞形、詞義演變的探源尋流及生成原因的探究工作上，使詞義訓詁更加走向深入。正如朱慶之所說：“漢文佛典的語言從整體上來看是一種既非純粹口語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語言變體，我們不妨稱之為佛教混合漢語。”^⑩

和所有翻譯作品一樣，漢譯佛典的語言或多或少會受到原典

語言的影響。因此漢譯佛典詞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些必須與原典語言比較對照，比如日本辛島靜志的《〈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中的難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五輯，巴蜀書社 2002），朱慶之的《“敢”有“凡”義及其原因》（《四川大學學報》1989. 2）、《“野馬”義證》（《古漢語研究》1990. 2）、《“將無”考》（《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影響”今義來源》（《文史知識》1992. 4）、《佛教漢語的“時”和“時時”》（《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巴蜀書社 1998）等一系列佛教文獻詞語考釋文章就運用了此法，因此具有一定的深度。2004 年在長沙召開的“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上，北京的兩位博士後，他們跟隨段晴教授學習梵文，所遞交的論文用梵漢對照的方法，糾正以往佛典詞語訓詁上的問題，新見迭出。比如朱冠明的論文《梵漢本〈法華經〉語詞札記》：所立“一切衆生，所立歡喜”（9/67a）之“所立歡喜”對應的梵文是 harsasthita（p22—7）。harsa 爲“歡喜”義，sthita 則是動詞 stha（站立）過去被動分詞，有 engagdin, occupied with 之義，整體 harsasthita 是個依主釋複合詞，義爲“充滿了歡樂”。羅什即譯作“其心皆歡喜”（9/4c）。但竺法護按字面硬譯爲“所立”，令人費解。（譯經中“所”常表被動，見朱慶之 1995）這應該是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一個方向。

當然，漢譯佛典語言研究也面臨着一些棘手的問題：首先，有一些佛典的譯出年代不明或所著錄的年代可疑，這有時會影響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其次，早期的譯經者大多來自印度或西域，漢語水平並不太高，因此譯作中也夾雜不少不甚規範的語言形式。第三，並非多數漢譯佛典能找到原典，有的連原語來源都不清楚（梵語、藏語、其他西域語？），是否受原典原語、受何種原語的影響不明。第四，訓詁學者中能通曉梵文、巴利文、藏文

或其他西域語言者又是鳳毛麟角，因此詞語訓釋就具有極大的風險。相對而言，中土佛教文獻語言既具通俗性（可為漢語史研究服務），又具可靠性（可為訓詁學服務），因此本人認為，在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同時，也應加強對中土佛教文獻語言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就以中古漢語詞語研究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一些中土佛教撰作，一方面受到漢譯佛典用語較為口語化的熏染，雖然從文體上尚未擺脫當時的駢儷之風，但用詞上已較為通俗。另一方面作者大多是中土文人（僧人），因此有較高的漢語素養，其作品大多是規範的語言材料，並且這些撰作對中土其他文獻語言的直接影響也遠比漢譯佛典為大，其語料價值不可低估。

魏晉南北朝時期，這類中土佛教撰作亦具有一定的數量，如僧人的行記、僧人的傳記、佛教經錄、寺院志、名僧居士宣揚佛教理論的論著以及兩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大量“志怪小說”中的“應驗記”等。具體而言，就有晉法顯《佛國記》，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弘明集》，梁寶唱《比丘尼傳》《經律異相》，梁慧皎《高僧傳》，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隋灌頂《國清百錄》、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等以及劉宋傅亮《觀世音應驗記》、張演《續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係觀世音應驗記》，劉宋劉義慶《宣驗記》，齊王琰《冥祥記》，隋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等一大批。加之這些中土佛教文獻涉及範圍甚廣，體裁多樣，因此使用的詞語極其豐富，對詞語訓詁有着極大的參考價值。

二、在訓詁體式研究方面，歷代的佛經義疏亦值得引起訓詁學者的重視。關於我國傳統訓詁學中的儒家經典“義疏”體的起源，存在着不同的認識。趙振鐸先生認為“魏晉時期清談之風盛行，出現了玄學。玄學主張剖析名理，談功成為士大夫一項重要事業。佛教聚徒講經，規模不小。釋道安首創義疏之學，講解佛教典籍。清談家和佛教徒的風習影響到儒生講經。一些學者也開

始講解經書。這類講經的記錄或講稿，稱爲‘義疏’或‘講疏’。”^⑩馮浩菲認爲，“魏晉時期，以王肅經說爲代表的王學爲爭奪學官地位和宣揚本派經學主張，向以鄭玄經說爲代表的鄭學發起進攻，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學術論爭。……產生了許多駁論體訓詁著作，也使疏體更加成熟，爲後來義疏的大興作好了準備”^⑪。而李建國先生則認爲：“從六朝開始，出現了一種新興的訓詁體式，這就是經傳的義疏。……六朝人去古已遠，不但對先秦古籍的文辭立意不易理解，就連漢代人的傳注也需要加以詮釋，纔能明了其義。經學要適應社會需要，繼續爲封建政治服務，必須以新的體式和方法對前代的傳注予以新的解釋，這樣，義疏之學就產生了。導致義疏學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佛教給予儒學的刺激和影響。佛教徒承受師傳，爲佛經作注，這是儒家給予它的影響。佛教徒推衍義旨，宣講經義，替佛經作疏，解釋比注經更爲周詳，又直接啓示了儒家。後來儒生也爲儒家經典作疏，……經學也由傳注的字義訓詁發展爲義疏講章之學。”^⑫之所以會造成不同的看法，原因之一，也許與佛經義疏、儒家經典義疏的比較研究進行得還不夠深入有關。本人認爲這一工作也應引起訓詁學史研究者的關注。另外，佛經義疏的語言研究也頗具價值，因爲六朝儒家經疏大多亡佚，而佛教經疏保留甚多，這也是一筆可貴的研究資料。

三、應進一步加強與境外的學術交流。在佛教語言研究方面，日本、韓國、美國（梅維恒）、挪威（何莫邪）、荷蘭（許理和）等都有很好的成果與經驗，我國的港、臺地區也開展得轟轟烈烈。我們應該加強學術交流，互相取長補短。海峽兩岸已舉行了兩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加強佛教文獻電子語料庫、研究資料庫的建設，編纂漢文佛教文獻語言詞典。對此，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有很好的設想和建議，他認爲，隨着漢語史研究與訓詁學研究成

果的日益豐富，目前已有可能並有必要編纂一部全面的《漢譯佛典語言詞典》，為此專門撰有《略論 21 世紀〈漢譯佛典語言詞典〉的編纂》一文^⑭，各位可以查閱，此不贅言。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注釋〕

- ①《新唐書·藝文志》列入“小說類”的中古小說凡 37 種。
- ②錢鍾書先生云：“六朝法帖，有煞費解處。此等大半為今日所謂‘便條’、‘字條’，當時受者必到眼即了，後世讀之，卻常苦思而尚未通。”“匹似一家眷屬，或共事僚友，群居閒話，無須滿字足句，即已心領意宣；初非隱語、術語，而外人猝聞，每不識所謂。”見《管錐編》（第三冊）1108—1109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
- ③參見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38 頁，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 ④郭在貽《訓詁學》144 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⑤曲守約《中古辭語考釋續編·弁言》，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2 年。
- ⑥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後記》，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 ⑦趙振鐸《訓詁學史略》141 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 ⑧湯用彤《談一點佛書的〈音義〉》，《湯用彤選集》327—328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⑨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115—134 頁，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 ⑩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15 頁，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 ⑪趙振鐸《訓詁學史略》142 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 ⑫馮浩菲《中國訓詁學》上 43 頁，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 ⑬李建國《漢語訓詁學史》修訂版 116—117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2 年。
- ⑭徐文堪《略論 21 世紀〈漢譯佛典語言詞典〉的編纂》，《中國辭書論集 1999》，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0 年。